



玉田書室詩稿箋注

范問予 著
霞紹暉 箋注

總編纂 舒大剛

《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 組織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巴蜀全書》(10@zh005)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書》(川宣〔2012〕110號)

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儒學研究中心後期資助項目(RX12H01)

四川省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項目號:SKQ201333)

玉田書室詩稿箋注

范問予 著
霞紹暉 箋注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何 靜
責任校對:周 穎
封面設計:經典記憶文化 鄒小工
責任印製:王 煒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玉田書室詩稿箋注 / 范問予著; 霞紹暉箋注.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4. 12
(巴蜀全書)
ISBN 978-7-5614-8256-8
I. ①玉… II. ①范… ②霞… III. ①詩集—中國—
當代 IV. ①I22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299678 號

書名 玉田書室詩稿箋注

著者	范問予
箋注	霞紹暉
出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發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書號	ISBN 978-7-5614-8256-8
印刷	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張	17.25
字數	36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120.00 圓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繫。
電話:(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
寄回出版社調換。
- ◆網址:<http://www.scup.cn>

《巴蜀全書》出版說明

《巴蜀全書》是收錄和整理巴蜀歷史文獻的大型叢書。該項工作二〇一〇年一月經由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準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同年四月又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準，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該計劃將對現今四川省、重慶市及其週邊亦屬傳統“巴蜀文化”區域內的各類古典文獻進行系統調查、整理和研究，實現對巴蜀文獻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體例最善、編纂最科學、使用最方便的著錄和出版。

《巴蜀全書》編纂工程，將收集和整理自周秦以下乃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撰著的重要典籍以及其他作者撰著的反映巴蜀歷史文化的作品，編纂彙集成巴蜀文獻的大型叢書。主體工作將分“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珍本善本”三大類型，計劃對兩千餘種巴蜀文獻編製聯合目錄和內容提要，對五百餘部、二十餘萬篇巴蜀文獻進行精心校點或注釋、評析，對一百餘種巴蜀善本、珍本文獻進行考察和重版。

通過編纂《巴蜀全書》，希望打造出巴蜀文化的“四庫全書”，為保存和傳播巴蜀歷代的學術文化成果，促進當代“蜀學”振興與巴蜀文化建設，奠定堅實的文獻基礎；為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貢獻力量。

《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

整理巴蜀文獻 傳承優秀文化

——《巴蜀全書》前言

舒大剛 萬本根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國文化，羣星璀璨。在祖國大西南，自古就傳承着一脈具有深厚歷史底蘊和鮮明個性的文化，即巴蜀文化。巴蜀地區，山川秀麗，物產豐富，自古號稱“陸海”“天府”；巴蜀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是古代長江文明的源頭，與“齊魯文化”“荆楚文化”“吳越文化”等同為中華文化之瑰寶。整理和研究巴蜀文化的載體——巴蜀文獻，因而成為研究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

一、綜覽巴蜀文化 增強自信熱力

巴蜀地區氣候宜人，資源豐富，是人類早期的發祥地之一。考古發現，這裏有距今二百零四萬年的“巫山人”，有距今三萬五千年的“資陽人”。這裏不僅有大禹治水、巴族廩君、蜀國五主（即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五個王朝）等優美動人的歷史傳說，也有寶墩文化諸古城遺址、三峽考古遺址、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小田溪遺址、李家壩遺址等重大考古發現。商末周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以及勇銳的巴師，曾參與武王伐紂。春秋戰國，巴濮楚鄧、秦蜀苴羌，雖互有戰伐，亦相互交流。秦漢以降，巴蜀的地利和物產，更是抵禦強辱、周濟天下、維護祖國統一、實現持久繁榮的戰略屏障和天然府庫。

在祖國“多元一統”的文化格局中，巴蜀以其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哺育出一批又一批傑出人物和文化精英，既有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常璩、陳壽、陳子昂、趙蕤、李白、蘇軾、張栻、魏了翁、李心傳、虞集、楊慎、唐甄、李調元、楊銳、劉光第、廖平、宋育仁、謝無量、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擘，也有朱之洪、張瀾、謝持、張培爵、吳玉章、楊庶堪、黃復生、尹昌衡、鄒容、熊克武、朱德、劉伯承、聶榮臻、陳毅、趙世炎、鄧小平等革命英傑，他們超拔倫輩，卓然振起，敢為天下先，樂為蒼生謀，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思想文化，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巨變，演繹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大劇。

歷代巴蜀學人在祖國文化的締造中，成就良多，表現突出，許多文化人物和文明成果往往具有先導價值。巴蜀兒女銳意進取的創新精神，使這種創造發明常常居於全國領先地位，成為祖國文化寶庫中耀眼的明珠。

在傳統思想、文化和宗教領域，中國素號“三教互補”，“儒”“釋”“道”交互構

成中華思想文化的主要內容，而儒學是其主幹。從漢代開始，巴蜀地區的儒學就十分發達，西漢蜀守文翁在成都創建當時全國首個郡國學校——石室學宮，推行“七經”教育，實行儒家教化，遂使蜀地民風丕變，並化及巴、漢，促成中國儒學重要流派——“蜀學”的形成，史有“蜀學比於齊魯”之稱。巴蜀地區是“仙道”派發源地，東漢張陵在蜀中創立“天師道”，中國道教正式誕生。東漢佛教傳入中國後，四川也是其重要傳播區域。

巴蜀“易學”源遠流長，大師輩出。自漢胡安（居邛崃白鶴山，以《易》傳司馬相如）、趙賓（治《易》持論巧慧，以授孟喜）、嚴遵（隱居成都，治《易》《老》）、揚雄（著《太玄》）而下，巴蜀治《易》之家輩出。晉有范長生（著《周易蜀才注》），唐有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宋有蘇東坡（著《東坡易傳》）、房審權（撰《周易義海》）、魏了翁（撰《周易集義》《周易要義》）、張栻（著《南軒易說》）、李石（著《方舟易說》）、李心傳（著《丙子學易編》），元有趙采（著《周易程朱傳義折衷》）、黃澤（著《易學濫觴》）、王申子（著《周易輯說》），明有來知德（撰《周易集注》）、熊過（著《周易象旨決錄》），清有李調元（著《易古文》）、劉沅（撰《周易恒解》），皆各撰易著，發明“四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巴蜀易學，普及面廣，自文人雅士、方術道流，以至引車賣漿之徒、簞桶織履之輩，皆有精於易理、善於測算者。理學大師程頤兩度入蜀，得遇奇人，遂有感悟，因生“易學在蜀”之歎。

巴蜀“史學”名著迭出、斐然成章。陳壽《三國志》雅潔典要，名列“前四史”；常璩《華陽國志》體大思精，肇開方志體。譙周《古史考》，開古史考證之先聲；蘇轍《古史》，成舊史重修之名著。至於范祖禹（撰《唐鑑》，助司馬光修《通鑑》）、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王偁（撰《東都事略》）、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朝野雜記》《宋會要》），更是宋代史學之巨擘，故劉咸忻有“史學莫隆於蜀”之說。

蜀人“好文”，巴蜀自古就是歌賦詩詞的沃壤。禹娶塗山（今重慶南岸真武山，常璩《華陽國志·巴志》、酈道元《水經注·江水一》），而有“候人兮猗”的“南音”，周公、召公取之“以爲《周南》《召南》”（《呂氏春秋·音初》）。西周江陽（今瀘州）人尹吉甫亦善作詩，《詩經》傳其四篇（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九一）。“文宗自古出巴蜀”，“漢賦四家”，司馬相如、揚雄、王褒居其三。陳子昂、李太白首開大唐雄健浪漫詩風，五代後蜀《花間集》與北宋東坡詞，開創宋詞婉約、豪放二派。“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同時輝耀於“唐宋八大家”之林；楊慎著作之富，位列明代儒林之首。“自古詩人例到蜀”，漢晉唐宋以及明清，歷代之遷客騷人，多以巴蜀爲理想的避難樂土，而巴蜀的山水風物又豐富其藝情藻思，促成創作高峰的到來。杜甫、陸游均以巴蜀爲第二故鄉，范成大、王士禛亦寫下千古流芳的《入蜀記》和《吳船錄》。洎乎近世，沫若、巴金，蔚爲文壇宗匠；蜀謳川劇，技壓梨園羣芳。

“三蘇”父子既是文學大家，也是“蜀學”領袖；綿竹張栻，不僅傳衍南宋“蜀學”之道脈，而且創立“湖湘學派”之新範。明末唐甄撰《潛書》，斥責專制君主，提倡民本思想，被章太炎譽爲“上繼孟、荀、陽明，下啟戴震”的一代名著。晚清廖平

撰書數百種，區分今學古學，倡言託古改制。錢基博、范文瀾俱譽其為近代思想解放之先驅。新都吳虞，批判傳統道德，筆鋒犀利，被胡適譽為“思想界的清道夫”。

在科技領域，秦蜀守李冰開建的都江堰，是至今還在使用的人類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漢代臨邛人民，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最早使用天然氣煮鹽的記錄。漢武帝徵閬中洛下閎修《太初曆》，精確計算回歸年與朔望月，是世界上首部“陰陽合曆”的範本。楊子建《十產論》異胎轉位術領先歐洲五百年。北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將本草學與方劑學相結合，是世界上第一部大型藥典和植物志。王灼《糖霜譜》詳錄蔗糖製作工藝，是世界上有關製糖技術的首部專書。南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將中國數學推向古代科學頂峰，其“大衍求一術”領先西方世界同類算法五百年。

至於巴蜀地區的鄉村建設和家族文化，也是碩果累累，佳話多多。他們或夫婦齊名、比翼雙飛（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楊慎與黃娥）；或兄弟連袂，花萼齊芳（蘇軾、蘇轍，蘇舜欽、蘇舜元，李心傳、李道傳、李性傳等）。更有父子祖孫，世代書香，奕世載美，五世其昌：閬中陳省華及其子堯佐、堯叟、堯咨等，“一門二相，四世六公，昆季雙魁多士，仲伯繼率百僚”（霍松林語）；眉山蘇洵、蘇軾、蘇轍及子孫輩過、籀，並善撰文，號稱“五蘇”；梓州蘇易簡及其孫舜欽、舜元，俱善詩文，號稱“潼山三蘇”；井研李舜臣及其子心傳、道傳、性傳，俱善史法、道學，號稱“四李”；丹稜李燾與其子壁、堽，俱善史學、文學，時人贊“前有三蘇，後有三李”。降及近世，雙流劉沅及其孫咸榮、咸炘、咸煥，長於經學、道學與史學，號稱“槐軒學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綜觀巴蜀學術文化，真可謂文章大雅，無奇不有！其先於天下而創者，則有導夫先路之功；其後於天下而作者，則有超邁古今之效！先天後天，不失其序；或創或繼，各得其宜。

二、整理巴蜀文獻 促進文化興邦

歷史上的四川，既是文化大省，也是文獻富省。巴蜀上古歷史文化，在甲骨文、金文和《尚書》《春秋》等華夏文獻中都有記錄，同時巴蜀大地還孕育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巴蜀文字”。秦漢統一後，歷代巴蜀學人又為我們留下了汗牛充棟、豐富多彩的古典文獻。唐代中後期（約八世紀初），成都誕生了“西川印子”，北宋初期（十世紀後期）又出現了“交子雙色印刷術”，標誌着雕版印刷的產生、成熟和創新，大大推動了包括巴蜀文獻在內的古典文獻的保存與傳播。據不完全統計，歷史上產生的巴蜀古文獻不下萬餘種，現在依然存世的也在五千種以上。

巴蜀文獻悠久綿長，影響深遠，上自先秦的陶字、金文，下迄漢晉的竹簡、石刻，以及唐刻、宋槧，明刊、清校，經史子集，三教九流，歷歷相續不絕，熠熠彪炳史冊。巴蜀文獻體裁多樣，內容豐富，舉凡政治之興替、經濟之發展、文化之繁榮、兵謀之奇正、社會之變革，以及思想學術之精微、高人韻士之風雅、地理民族之風貌、風俗習慣

之奇特，都應有盡有，多彩多姿。它們是巴蜀文化的載體，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表徵。

對巴蜀文獻進行調查整理研究，一直是歷代巴蜀學人的夢想。在歷史上，許多學人曾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和出版付出過熱情和心血，編纂有各類巴蜀總集、全集和叢書。《漢書·藝文志》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或許是巴蜀學人著述的首次彙集。五代的《花間集》和《蜀國文英》，無疑是輯錄成都乃至巴蜀作品的最早總集。宋代逐漸形成了“東坡七集”（蘇軾）、“樂城四集”（蘇轍）、“鶴山大全集”（魏了翁）等個人全集，以及《三蘇文粹》《成都文類》等文章總集。明代出現楊慎的個人全集《升庵全集》和四川文章總集《全蜀藝文志》。入蜀為官的曹學佺還纂有類集巴蜀歷史文化掌故而成的資料大全——《蜀中廣記》。清代，李調元輯刻以珍稀巴蜀文獻為主的《函海》，可視為第一部具體而微的“巴蜀文獻叢書”。近代編有各類“蜀詩”“蜀詞”“蜀文”和“川戲”等選集。這些都為巴蜀文獻的系統編纂、出版做出了有益嘗試。

二十世紀初，謝無量曾提出編纂《蜀藏》的設想，因社會動盪而未果。胡淦亦擬編《四川叢書》，然僅草成“擬收書目”一卷。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下達，國家成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四川也成立了“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製定出《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一九八四——一九九〇）。可惜這個規劃並未完全實施，巴蜀文獻仍然處於分散收藏甚至流失毀損的狀態。

二〇〇七年初，國務院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全國各省紛紛編纂地方文獻叢書。四川大學和四川省社科院的學人再度燃起整理鄉邦文獻的熱情，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提交“編纂《巴蜀全書》，振興巴蜀文化”的建議，四川省委、省政府再度將整理巴蜀文獻提到議事日程。經過多方論證研究，二〇一〇年一月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將四川大學申請的《巴蜀全書》納入全省古籍文獻整理規劃項目”；四月又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將《巴蜀全書》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千百年來巴蜀學人希望全面整理鄉邦文獻的夢想終於付諸實施。

《巴蜀全書》作為四川建省以來最大的文獻整理工程，將對自先秦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的著作或內容為巴蜀文化的文獻進行全面的調查收集和整理研究，並予以出版。本工程將採取以下三種方式進行：

一是編製《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古今巴蜀學人曾經撰有大量著作，這些文獻在歷經了歷史的風風雨雨後，生滅聚散，或存或亡，若隱若現，已經面目不清了。該計劃根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旨趣，擬對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進行全面普查和系統考證，探明巴蜀文獻的總量、存佚、傳承和收藏情況，以目錄的方式揭示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

二是編纂《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汗牛充棟，它們是研究和考述巴蜀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對這些文獻，我們將採取三種方式處理：首先，建立“巴蜀全書網”，利用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對現存巴蜀文獻進行掃描和初步加工，建立“巴蜀文獻全文資料庫”，向讀者和研究者提供儘可能集中的巴蜀文化資料。其次，本着“去粗取

精，古為今用”的宗旨，按照歷史價值、學術價值、文化價值“三結合”的原則，遵循時間性、代表性、地域性、獨特性“四統一”的標準，從浩繁的巴蜀古籍文獻中認真遴選五百餘種精品文獻，特別是要將那些在中華傳統文化體系中具有首創性和獨特性的巴蜀古籍文獻彙集起來，進行校勘、標點或注釋、疏證，挖掘其中的思想內涵和治蜀經驗，為當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建設服務。第三，根據巴蜀文化的歷史實際，收集各類著述和散見文獻，編成儒學、佛學、道教、民族、地理、文學、藝術、科技、碑刻等專集。

三是重版《巴蜀文獻珍本善本》。成都是印刷術發祥地，巴蜀地區自古以來的刻書、藏書事業都很發達，曾產生和收藏過數量眾多的珍本、善本，“蜀版”書歷來是文獻家收藏的珍品。這些文獻既是見證古代出版業、圖書館業發展的實物，也是進行文獻校讎的珍貴版本，亟待開發，也需要保護。本計劃將結合傳統修復技藝和現代印刷技術，對百餘種巴蜀文獻珍稀版本進行修復、考證和整理，以古色古香的方式予以重印。

通過以上三個系列的研究，庶幾使巴蜀文獻的歷史得到彰顯，內涵得到探究，精華得到凸顯，善本得到流通，從多個角度實現對巴蜀文獻的當代整理與再版。

盛世修書，傳承文明；蜀學復興，文獻先行。“《巴蜀全書》作為川版的‘四庫全書’，蘊含着歷代巴蜀先民共同的情感體驗和智慧結晶，昭示着今天四川各族人民共有的文化源流和精神家園。”（《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會議文件。下同）《巴蜀全書》領導小組要求，“我們一定要從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打牢四川人民團結奮鬥共同思想基礎的高度，來深刻認識《巴蜀全書》編纂出版工作的重大意義。特別要看到，這不是一件簡單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而是一件幾百年來巴蜀學人一直想做而沒有條件做成的文化盛事，是四川文化傳承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無論是中國古代的文化發展，還是世界近世的文明演進，都一再證明：任何一次大的文化復興活動，都是以歷史文獻的系統收集整理為基礎和先導的。我們希望通過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出版，給巴蜀文化的全面研究和當代復興帶來契機，為“發掘和保護我國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做一些基礎性工作。

有鑒於此，《巴蜀全書》領導小組明確要求，要廣泛邀請省內外專家學者參與編纂，共襄盛舉。這一決策，實乃提高《巴蜀全書》學術水準和編纂質量的根本保障。領導小組還希望從事此項工作的學人，立足編纂，志在創新，從文獻整理拾級而上，自編纂而研究，自研究而弘揚，自弘揚而創新，“利用編纂出版《巴蜀全書》這個載體，進一步健全研究巴蜀傳統文化的學術體系，以編促學、以纂代訓，大力培養一批精通蜀學的科研帶頭人和學術新人”。可謂期望殷切，任務艱巨，躬逢其盛，能不振起？非曰能之，唯願學焉。《巴蜀全書》的編纂希望為巴蜀的文化建設和“蜀學”的現代復興擁護前趨，至於搭建橋梁，開闢荊榛，上繼前賢，下啟來學，固非區區之所能，在此僅樹其高標，以俟高明云爾！

二〇一四年五月

辛巳三月受請壬午二月末
 袖回越日展卷讀序題簽
 湘子鄭廬同了此願耶？
 王田 鈔 忡



范愛衆爲詩集題簽



詩人二十歲芳照



謝家田留學巴黎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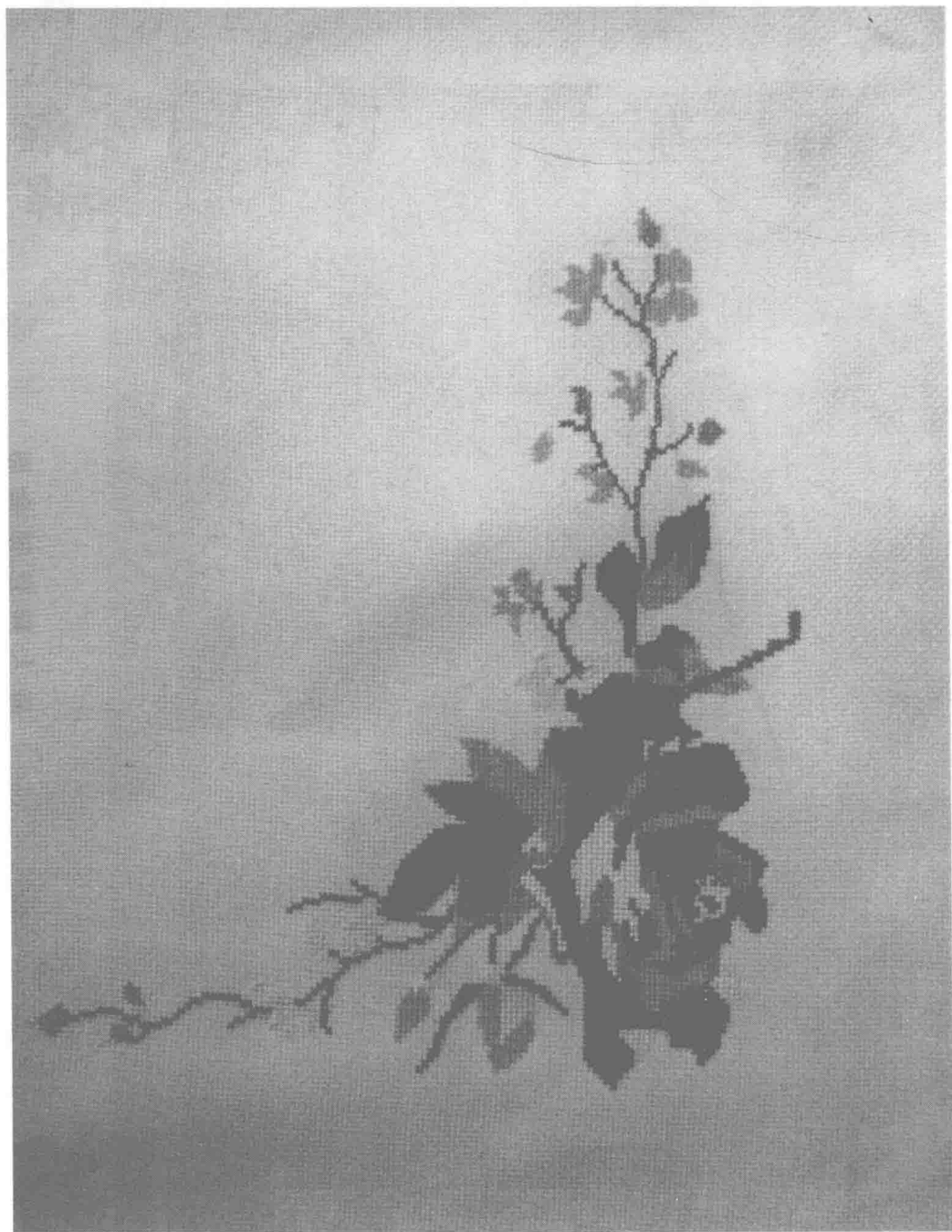
玉田書室詩稿

別女行

和樂一家春。何當我獨行。骨肉各一隅。豈不為犧牲。犧牲何足惜。寧不傷我情。惆悵臨行時。依依出天真。聲々呼阿母。淚已濕征塵。顧此一相別。安可期相親。春暖涉春波。誰與共芳晨。不見嬌女笑。徒聞江水聲。江水碎我心。此情難以伸。萬事都餘恨。紙攢黯傷神。神形俱不寧。此別為何因。人生祇百年。曷極其酸辛。回頭望江南。空有淚痕新。



詩人與兒孫合影



詩人的綉花作品

心靈的莫慰 特殊時代的女性悲情

——《玉田書室詩稿箋注》序

一

中國是一個充滿着詩的歌與情的國度，放眼世界，似乎沒有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一樣，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如此執著地鍾情於詩歌和詩歌創作；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一樣，一代一代地吟誦着那些吐納山川、吟詠日月、抒發性靈、歌讚美善的錦心繡口。縱觀整個中國歷史，詩歌和詩人在中國人的心中，都處於十分高貴的地位。即使在白話主導的近現代，中國人仍然難以擺脫對古典詩歌的癡迷與執著，正如北宋張先《千秋歲》詞所言：“天不老，情難絕。心似雙絲網，中有千千結。”中國人的古典詩歌情結也如同中國結一樣，精緻玲瓏，寄意深遠。

《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每首詩都是詩人情緒的抒發，情感的展現，心靈的慰藉。正因如此，才能喚起讀者的情志，灌注讀者的精神世界，並產生共鳴，推動讀者對人生的或冷峻或熱烈狀態下的情致超越。人的情緒，往往是那些與常規生物性相悖離的衝動。這種衝動屬於具有共同心理的人的共性，所以當我們舉杯，便會想到詩人李白；當我們直面人生命運的冷酷，便會想到詩人杜甫。不是說人們的心靈律動被詩人創造，而是人們的情興與思緒被詩人撩撥。詩人和詩的存在，能讓我們產生對生命的歡愉和惆悵的理解和反思。

詩歌的產生，我們可以追溯到人的精神領域；而詩歌的作用，就在於其能讓我們的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環境相律一。詩歌，是心靈的蘇醒，是情志的袒露，是對生命本質的素描，是對生命情調的詠歎，是對生命理想的發掘；是在空靈的感悟或體驗中展現精神的飄然與不羣，是在庸常的浮華或困頓中逼視心靈的洞察。孔子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這是聖人對詩歌功能的高級概括。“興”是指創作主體借助於某個具體的物象而引發的某種心靈體驗和情感活動，是物我之間的交融和相互觀照。“觀”是指一定時期人們的內在精神心理狀態。“羣”是指個體的人在社會生活中如何與他人和諧相處。詩不僅僅是創作主體的自我訴說與自我表現，

它還兼有與他人的協律。“怨”就是譏諷，是人們對社會現實的一種情感狀態，表達人們對社會的不滿情緒。我們不難看出，“觀”和“羣”則重於社會效果，“興”和“怨”側重於個體感情的抒發。清人沈德潛很好地詮釋了這種詩學理念：“詩之爲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直至今日，我們還守護着這種詩學觀。

詩歌，作爲一種文學藝術表現形式，有着深刻的文化基因和歷史背景。中國古典詩歌與西方詩歌不同：西方詩歌強調寫人，寫人的情欲、意志和力量，寫人的內在衝動、需求和願望，認爲有慾望和衝動才是真正的人，個性的人，自由的人。這是人在藝術上的覺醒，也是人在藝術中的自我發現和自我梳揚。而中國古典詩歌重在言志，即在抒發個人情緒的同時，無不浸潤着個人對社會的傾訴和對正義的追求。故產生於中國歷史中的偉大詩歌，往往是在抒發個人情緒的同時，帶有強烈的正義和理性。翻開中國詩歌總集，撲面而來的情緒，都無不抒發着對家國興衰、民族命運的強烈關注。正是這樣，中國詩歌才如此華麗和動人，才如此敦厚和超然。即便是以西方藝術形式包裝的中國近現代白話詩，也不能剝離古典詩歌的“言志”追求。有人說，中國人學詩，自蒙童就開始了。於是，在這種集體無意識中，中國人的古典詩歌情結不只是表露出“望子成龍”的熱望，它似乎還隱藏着一個民族的期待：我們民族的未來需要詩人和詩歌。

“詩言志”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基本命題，也是中華民族在詩歌藝術上的永恒追求。

二

《玉田書室詩稿》是川籍詩人范問予女士（一九〇〇—一九六九）及其家人的遺作。范問予原名雯瑜，四川富順人。其父輩兄弟二人，生父沒有參加革命，姓名、事蹟渺杳難知。叔父范金（字秋嵐）無子女，故范女士自幼過繼叔父，其唯一的胞弟范龍光則留在長房。按照習俗，范女士改稱生母爲伯娘，叔娘爲媽。因生母與叔娘皆出身於詩書門第，故范女士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文學啟蒙教育。據其幼子謝幼田^①所述，范女士自幼便能背誦大量詩詞歌賦。不但如此，她還能長篇記誦《紅樓夢》《西廂記》等傳世巨

^① 謝幼田，一九四〇年生。早年師從經學家杜剛伯研習先秦史。改革開放後，考入四川省社會科學研究院，任哲學所專職研究員。一九八七年赴美，被聘爲斯坦福大學胡夫研究所研究員。二〇〇六年退休回國，定居四川成都。